

書名：《清代詩學史》（第二卷）

作者：蔣寅

出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9 年 11 月

頁數：744 頁

繼 2012 年蔣寅教授《清代詩學史》（第一卷）出版七年之後，學界期待已久的《清代詩學史》（第二卷）“學問與性情”（1736—1795）而今又以同樣的巨帙長篇呈現在我們面前。作為通史性詩學論著的第二段分期，該卷主要論述對象是乾隆朝詩學，這在第一卷導論解釋清代詩學分期時就已劃定：“清代詩學史的分期也就是順、康、雍三朝為一期，乾隆朝為一期，嘉、道兩朝為一期，咸、同、光三朝為一期。”¹ 如此分期與對詩學史的理解有關，作者認為，詩學史“是融觀念史、批評史和學術史為一體的工作”，“和清代詩歌史、批評史及學術史是緊密地交織在一起的，也可以說正是在三者的互動中展開的”。² 正因為秉持這樣的詩學史觀念，作者在撰寫過程中致力於展示出詩學史發展過程中的多樣與豐厚，這也是作者自研究王漁洋詩學時便提出的“進入過程的文學史研究”這一學術理念的延伸與持續踐行。

第二卷開篇緒論，從社會政治環境、文壇風氣、官方文藝趣味、詩歌風氣等多個方面，多角度來進一步論述乾隆朝詩學作為獨立分期單位的合理性與自足性。研究對象的不同，本身就決定了第二卷在寫作上呈現出不同於第一卷的特性，比如放棄第一卷以地域為單位的論述模式，即是因為乾隆朝詩學並不具備明顯的地域色彩，最終決定的方式是“根據大致的時間次序，以人物和思潮為中心而不是以問題為中心來展開論述”（頁 49），這是充分考慮了研究對象

1 蔣寅：《清代詩學史》（第一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 年，頁 49。

2 同上注，頁 48—49。

的特性後做出的選擇。第二卷從時間與內容上說是對第一卷的綫性延伸,方法上則進一步自證有效,為學界推進清代詩學研究提供了標杆式示範。而更重要且關鍵的,是作者在寫作過程中對自我的不斷超越,尤其是能夠在諸家論斷上出新,於各路研究中撥出新的方向,雖然作者或出於謙抑,說“這部《清代詩學史》其實不是寫給研究清代詩學的人看的,倒毋寧說是寫給不研究清代詩學乃至不研究古代文學的讀者看的”(頁743),但從思維邏輯、研究方法、表達方式、剖析文獻等等技術角度來看,全書無疑毫無保留地示後來研究者以津梁。正如作者所說,第二卷“更多的是獨辟蹊徑,在許多老生常談的問題上拿出自己的獨到看法”(頁743),如此獨樹一幟的創新精神,正是學術研究的核心價值所在。

一、進入詩學史過程,展示歷史豐富性

在以前詩學史的敘述框架中,往往飄浮著“格調”、“性靈”、“肌理”等概念,似乎以此便可統攝乾隆朝詩學,但單單闡釋概念的解說,畢竟不能展示出其生發及與周圍環境互動的過程,有骨無肉,談不上鮮活。不寧唯是,某些研究對概念的孤立解說,因其似是而非的模糊性和錯誤的解釋,嚴重地誤導了學界。“進入過程”是作者從研究清初王漁洋詩學時便提出的觀點,要求研究者能夠充分體諒、理解甚至化身為研究對象,設身處地去體察、思考其在當時的環境中可能面對的問題,仿佛在研究對象身上安置一件微型攝像頭,以這樣貼身的視角盡力還原歷史,從而更豐富地展示出各種可能性。這種研究方法的提出,因其對歷史的尊重態度,最大程度上克服了可能出現的文獻解說錯誤,避免在學術上造成誤導。

以本卷第三、四章對“性靈詩學”的研究為例,第三章主要論述袁枚與性靈詩學流行的關聯,從乾隆前期性靈思潮的萌動談起,揭示袁枚性靈詩學的要義,繼而用袁枚對女性詩歌的倡導進一步證明他的詩學觀,順帶討論《隨園詩話》的撰著方式,以及袁枚詩學的歷史意義及影響;第四章探討性靈詩學思潮的回響,分別從趙翼、蔣士銓、李調元、洪亮吉、方薰和吳文溥等人對性靈詩學的

接受與傳播入手，展示性靈論在詩壇得到的廣泛而各有區分的響應，最後談及性靈詩學的理论收穫。既有理論思辨，又展示出性靈論從萌生到衰變的過程中幾乎涉及到的方方面面的問題。

即使是在一些很細微的闡論方面，也能看到作者對“進入歷史”這種方法的一以貫之，例如在評價李調元《全五代詩》編纂價值時，指出“李調元生活的時代，運用文獻已比王漁洋編《五代詩話》時方便很多”，“許多唐宋秘籍已藉《四庫全書》的編纂得到普及流通，他可以從容地翻檢考證”（頁 446）。因此，《全五代詩》在傳記文獻考訂上勝過《全唐詩》就容易理解。這其實是從閱讀史、藏書史的角度來考察歷史過程，這一視角早在王漁洋的研究中就初現端倪。³ 後來在研討翁方綱的詩歌批評時，也從文獻的語料來源角度進行了分說（頁 586）。

長於概念辨析向來是作者的研究亮色，這實際也是進入過程的研究帶來的必然結果。比如對“切”這一概念的分析，“切”的意思是“語意妥帖，確當而不浮泛”（頁 260），王漁洋論詩主“不切”，袁枚論詩則主“切”，“性靈派講究切是破除一切格調派的框框後退守的底綫，而紀昀講究切卻有可能緣於試帖詩觀念的影響”（頁 234）。“翁方綱試帖詩批點中顯出重‘切實’的意識，也可以同他切己切事切境的主張聯繫起來思考”（頁 593）。由此我們能夠看到，“切”這一概念在不同時段、不同詩學家的使用中具有不同的背景與偏重，要進入語境的發生過程纔能有所把握。換言之，只有進入過程，纔能夠知曉不同語境不同詩學中的概念所指。

此外，通過觀察到一些語例的使用頻率，可使我們捕獲作者的心思。正如在論述紀昀的詩學批評成就時，作者敏銳地覺察到“平心而論”一詞在《四庫提要總目》的集部出現頻率較高，認為“這絕不是個偶然的語言現象，它顯然是一個表明批評立場折衷持平的習慣用語”（頁 254）一樣，通讀第二卷便會發現，“從後設的角度看”這一短句從緒論到每一章的行文中幾乎都有出現，在作者提倡進入過程的視角下值得關注。“後設視角”與“進入過程”的基本邏輯不同，前者是從後來的立場將前代文獻加以建構，後者則是試圖還原過程、親歷現

3 蔣寅：《王漁洋與康熙詩壇》第六章“王漁洋藏書與詩學的關係”，南京：鳳凰出版社，2013 年。

場,二者在行文中的交織使用令我們意識到,作者的敘述視角是在轉換的,能讓我們區分研究者看問題的角度,不將問題混為一談,從而使問題的層次展露得更加清晰。如在論及學界素來認可的袁枚性靈詩學對沈德潛詩學的反撥時,作者指出這樣的看法其實是一種後設立場,因為如果回到歷史過程中,點檢袁枚答高密詩人李憲喬的信,當時李氏希望袁枚能夠與自己聯手,擊潰沈氏詩學流弊,而從袁氏答復可知,他不以詩教為敵,當時的心腹大患反而是“乾隆後期流行的以考據入詩的風氣”。(頁 385)這便將歷史剖開在讀者眼前,由此就將相信哪種歷史敘述的選擇權,交到了讀者手里。

另一個有代表性的語例,是在直接代入研究對象時體現出來的。比如在研究翁方綱詩學理論支點時,作者一開始便問自己,“如果說杜、韓、蘇、黃為質厚的美學提供了一個取法的路徑,那麼接著產生的問題就是從哪個層面去學這些作家,或者說取法的落腳點在什麼地方。替翁方綱想想,這的確是個問題。”(頁 539)在涉及到學人詩理論建構時,作者又問自己,“事、境兩個概念畢竟只涉及寫作的素材層面,要構築起完整的理論基礎,他還需要更多的概念、範疇”。(頁 547)這裡完全體現出作者將自己代入到翁方綱所處的環境當中去思考問題,清楚地揭示出如何進入思維過程研究的路徑。當然,這是建立在研究者對研究對象非常熟悉,乃至於達到能夠無礙地理解研究對象的境界之上。

二、學問與性情在乾隆朝詩學中的浮潛

經年沉浸於閱讀清代詩學史文獻,通過對比使作者逐漸意識到,到了清代中葉,詩歌中有關性情和學問比重與關係的討論,已然成為詩學的核心問題。因此,本卷出現了一個引人矚目的副標題,遴選出“學問與性情”來標舉乾隆朝詩學脈絡的浮潛。這其實在第一卷導論中談及天分與學力之爭時便已埋下伏筆,這個可以追溯至唐代的爭論,到了清代,“出於對明代空疏學風的反撥,無不主張博學多讀書,但他們對天分與學力的關係作了多方面的闡發”。⁴ 錢謙

4 蔣寅:《清代詩學史》(第一卷),頁 29。

益、黃宗羲、徐乾學等對此皆有論述。第二卷又引述錢大昕“才學識情”四分法（頁142）道出二者之間的關係：“有才而無情，不可謂之真才。有才情而無學識，不可謂之大才。”⁵ 面對體量如海的清代詩學文獻，正因作者堅持“進入過程”的研究法，故而能從所寓目的巨量文獻當中，敏銳地察覺並分辨出“學問與性情”這個問題到了乾隆朝已十分突出，成為詩學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不容避開的問題，乾隆朝諸家詩學觀的建立和發展也基本都要面對這個問題。

若按大致時間順序來描繪作者對這一問題在清代的認知曲線，約略如下：“在格調派主導詩壇的乾隆初，不只是沈德潛的詩學已冒出學人之詩的苗頭，另外一些著名詩人在才學關係上也較偏重於學。”（頁492）紀昀的詩學觀則是“本出入於神韻、格調、性靈之間，氣格與聲調兼求，才情與學問並重”（頁206）。而以學人詩理論為主的翁方綱，明顯是偏向才學。只有破除一切的性靈派代表袁枚，視援考據入詩如臨大敵，旗幟鮮明地強調性靈。這與第二卷緒論所談及的乾隆朝文壇風氣的段落形成連鎖呼應，乾隆時期可以說是繼承並發揚清初興起的重學輕文的思想風潮，張燾所謂“以實學為文，合經與文而為一”⁶ 即是代表。這樣一種風氣對於學術而言無疑是幸運的，“乾嘉學風”成為一個專有名詞即可見出風氣之盛，但若換到文學的立場而言，“學術繁榮同時也產生一個問題，即它給那些不事經術的純文人造成一種無形的壓力”（頁18），並舉清代純粹的詩人黃景仁為例：

即使是黃景仁這樣名盛一時的天才詩人，在文壇、幕府和沙龍中也能感覺到，人們在嘉譽、傾慕之餘又不免流露出的些許遺憾，面對親故友善的勸誡，內心深處不能不滋生一絲自卑之感或以反面形式表現出的自傲之意。像他們這樣的文人，除了以性靈或抒情為盾牌，抵抗來自學者群體的輕鄙和排斥，還能有什麼更好的自尊理由呢？（頁19）

5 錢大昕：《春星草堂詩集序》，載陳文和主編：《錢大昕全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冊9，頁421。

6 張燾：《西莊始存稿序》，載陳文和主編：《嘉定王鳴盛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冊10，頁4。

對於黃景仁而言,他的詩歌成就自然是不言自明,但當這樣一位天才詩人被裹挾在當時“重學”的思想風氣之下時,對他的完全屬於詩人的自我恐怕也是難以完全接納,這樣微妙矛盾的處境和心理,有力地證明學術與性情“在很大程度上就成了乾隆朝士人生活和文學觀念發生衝突的焦點”(頁19)。

對比其他清代詩學史的寫法,在各家詩學觀念這個顯性脈絡之外,“學問與性情”無疑成爲思索乾隆朝詩學觀念起伏的一條有力綫索。

三、獨辟蹊徑的創新精神

在以往所撰清代詩學史中,提及乾隆朝詩學,撲面而來的概念便是沈德潛“格調”、袁枚“性靈”與翁方綱“肌理”諸說,但經過第二卷運用“進入過程”這一方法重新處理有關這些概念的問題,讀者將發現,這些被翻來覆去談論的概念和與之捆綁在一起的詩學家,或者並不像連綫題那樣簡單地對應著。比如論述沈德潛“格調”派,作者總結如下:

沈德潛詩學自近代以來一直被命名爲格調派,但就其包容和綜合的性格及以獨創性爲旨歸的理論傾向來說,已和明代格調派相去甚遠。沈德潛借助於格調派的理論框架,融入王漁洋神韻說的精髓,並通過一系列選本建構起一個具有包容性的詩歌理想及相應的經典序列。如果非要與格調派掛鉤的話,也不妨稱之爲新格調派。它同時具有倫理品格之善和藝術趣味之正這兩種古典主義的基本品格,同時對明代格調派的古典主義又有所改造,具有新古典主義的色彩。(頁165)

這便將沈德潛的所謂“格調”與明代格調派區分開來,通過對文獻的剖析,掘發出沈德潛的詩學品格關鍵在於包容,并用“新格調派”、“新古典主義”來形容沈氏詩學的特色,這便讓我們將沈氏詩學放置在當時的話語場中,從而對其品格和意涵有了新的把握。

至於覆核翁方綱“肌理”說之形成後,結果更令人驚訝:原來,學界如今對

“肌理”說的所謂共識，其實是建立在郭紹虞先生 1946 年發表的《肌理說》一文上，但作者通讀乾隆朝詩學理論和批評之後，卻指出郭先生的結論值得商榷：“當我們仔細考究乾隆時代的詩學文獻，不要說肌理說在當時有無影響還是個疑問，就是翁方綱詩學是否被視為一家之言也很難說。”（頁 524）經過對文獻的爬梳與思辨，作者提出的論點如下：

肌理雖以概念的新穎而為人注意，但它只處於翁方綱詩學理論的底層，還不足以成為支撐學人詩理論的骨幹概念。它的意義只在於彌補了向來詩學對文本組織層面關注的不足，以一個形象的概念闡明了文理與句法、修辭的關係，從而將若干傳統文法概念包括正面鋪敘、逆筆、樺縫等統攝起來，使古典詩學在文本層面獲得一組清晰合用的概念群。（頁 553）

將“肌理”在翁方綱詩學理論中究竟占何地位，影響若何分析得明白清楚。釐清翁方綱詩學理論的要義與品格，在破舊說的基礎上建立新說，紮實可信。

另外，此前學界在探討紀昀詩學時，經常使用的是《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以及紀氏批點詩歌這類文獻，而本卷在進一步深化分析的基礎上，拈出紀昀《唐人試律說》所標誌的試帖詩學強調其價值所在，通過討論試帖詩學第一要義“切”這一審美概念，作出合理的延展與推想：“古典詩歌美學的基本價值範疇，大概頗有一部分是在試帖詩學中傳承和光大，同時通過試帖詩學所佔據的蒙學教育渠道廣泛傳播的。”（頁 262）提出試帖詩學與一般詩學的互動合流這個值得關注的新問題，對試帖詩學價值的再認識等，這些都是運用“進入過程”研究方法帶來的結果，同時也是本卷在學術上的重要創新。

四、動態展示學術研究過程

在寓目巨量文獻的基礎上發掘出“新”文獻。清代文獻數量之巨已是有目共矚，以一己之力游弋其中，無疑是對體力和腦力的雙重考量。正是在這基礎之上，作者對文獻的定位和品評纔顯得既準確又深入，比如論述方世舉詩學

時，一針見血地指出其桐城派詩學的蒙學特徵，如此定位，清晰而深刻。至於對“新”文獻的掘發，如洪亮吉《北江詩話》中意象式長評，三百年來一直未受到注意，作者在這如流沙般的文獻之河中，披沙揀金地掘發出新的文獻，本身就顯示出把握文獻的深厚功力。

研究的深化與細化。作者對清代詩話的評價也是隨著文獻的拓展、視野的回溯而逐漸發生變化的，如在撰寫本卷過程中，重讀賀裳《載酒園詩話》對唐代詩人的評價，意識到“詩話的散漫形式也可以負載很有系統、很有條理、很周密的批評”。（頁 411）這一認識在此前撰寫第一卷時尚未如此清晰，正是在研究乾隆朝趙翼《甌北詩話》的過程中得到進一步確認，前後貫通，纔得出“詩話作為傳統的詩歌批評形式，發展到清代也具備了系統、深入和細膩的特徵”（頁 411）這一結論。

指出新的學術增長點。這在論著中俯拾即是，茲舉一例：在論述《四庫提要》的批評成就時，以元代謝宗可《詠物詩》提要為例，指出“元代詠物詩在取材和藝術表現上多有開拓，《提要》指出的‘彌趨新巧’就是很值得重視的趨向，至今尚未被學界注意”。（頁 251）

以上種種造微之處，都凝聚著作者的心力，展示出一個交互的、複雜的研究過程，使讀者在閱讀中習得如何對待學術史、批評史和觀念史，一言以蔽之，學術研究要進入過程——學術本就是在對文獻的不斷掘發與深入闡釋上逐漸建立起來的動態過程。

總之，《清代詩學史》（第二卷）在繼承、突破第一卷的基礎上，又與第一卷一起，繼續豐富我們對清代詩學的認知。第二卷在方法上繼續細化、深入地運用“進入過程”去貼近研究對象，在寫作方式上呈現出“各章節內容的互見和關聯也更為頻繁更為緊密，而且與前代詩學的關涉也隨處可見”（頁 743）的特徵，也可從本卷對乾隆朝詩學的趨向分析中，稍稍探尋到第三卷即嘉道兩朝詩學的訊息，比如性靈詩學而後的“絕對化的自我表現論”（頁 410）就是其中之一。這為學界帶來新的期待。

（作者：華南師範大學文學院博士後 李小雨）